咸同兵燹與“詞史”寫作的展開、重塑及經典化*

莫崇毅

提　要

咸同時期,在戰爭的刺激下,詞人們將所見所聞及心中悲痛直白地記録在詞作中,産生了數量不菲的直賦其事式“詞史”作品。這些作品並不契合周濟在比興寄托詞學思想上提出的“詞史”觀。戰爭帶來的盛衰之感在戰後持續發酵,而此時常州詞學影響漸廣,周濟的“詞史”觀得到了更大範圍的接受與發展。深受常州詞學影響的批評家在搶救咸同燼餘詞籍時,放大了興寄式“詞史”作品的聲量,甚至建構起部分戰前作品的“詞史”意義。戰爭的深層影響與清代詞學的内在發展脈絡形成合力,主導了咸同“詞史”寫作的經典化進程。

關鍵詞:“詞史”　咸同兵燹　常州詞學　直賦其事　比興寄托

一、咸同時期規模龐大的直賦式“詞史”寫作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有感於咸豐年間趙起詞作中“骨肉凋零,兵戈滿眼”之語,主張將杜甫、白居易詩法“運入減偷”以“蔚爲詞史”。與此同時,他

* 本文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清詞自注研究”(項目編號 20CZW022)的階段性成果。

認爲咸同兵燹以來"作詩者多,而詞頗少見",以直賦筆法紀事抒懷的"詞史"寫作較爲罕見。[1]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咸豐三年(1853)二月,金陵城破,前浙江樂清協副將湯貽汾投水而死。消息很快傳遍了江南。

年初,袁枚之孫、袁通之侄袁起聽聞金陵城被圍的消息,驚懼難安,先後填《喝火令》三闋憶親友,第一首小序稱:"白下烽煙,兩月未斷……音耗久疏,存亡難測。"第二首表達對圍城中友朋的牽掛,其中就包括湯貽汾。在隨後的一年間,袁起不斷收到噩耗。翌年三月,一封五個月前寄出的書信終於送到袁起的案頭,信中傳來湯貽汾自沉的消息。袁起"揮涕諷吟,離腸慘裂",填《浣溪沙》四首,直抒悲痛:"一紙傳來絶命辭。開函頓使我驚疑。昨宵夢見似平時。忠骨倉皇何處葬,招魂奠醊可能知。今生把臂永無期。"數日後,袁起哀從心起,再賦《浣溪沙》一首,作:"一帶長江血染殷。兵戈猝逼白門灣。破巢幾箇卵能完。　忍把戰爭憑劫運,怕聞故舊半凋殘。終朝洗面淚難乾。"[2]從剛接到湯貽汾噩耗時的震驚,以及對湯貽汾箇人的哀悼,發展到創作第五首《浣溪沙》時,袁起的情感已經延展爲對金陵覆巢之禍的哀慟。

除了袁起之外,趙起、王壽庭、陳宇、章樹福、蔣敦復、許光治、吴樟、吴霞佐、王友光、楊錦雯、陸增等人在得知湯貽汾去世的消息後,也都填詞記録下這一事件,並抒發心中哀思。王壽庭的《滿江紅・湯雨生都督挽詞》結合四則自注,對湯大奎、湯荀業、湯貽汾的三代忠孝事蹟,以及湯貽汾的文藝成就予以了表彰,稱其"縱燒殘劫火,血痕猶碧"。[3]　吴樟《滿江紅・用岳忠武韻弔湯貞愍公殉難江寧》將湯貽汾比作屈原,稱:"痛此際、石頭城陷,捐軀何烈。千載長流湘沅水,一心耿照秦淮月。"[4]蔣敦復感慨於"江省之陷,湯雨生都督、劉須溪大令、王蔗薌秀才死之,皆吾友也",填《賀新涼》詞抒發痛心世事而又報國無門的憤慨,詞情激越,"無端撒手成千載。忽中宵、裸身大叫,慷當以慨"![5]

1　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册4,頁3529。
2　張宏生:《全清詞・嘉道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册20,頁137、146、148。
3　同上,册22,頁543。
4　同上,册26,頁552。
5　同上,册27,頁284。

湯貽汾並不是清代詞壇上的一流作家，但他在嘉道詞壇的影響力卻不容小覷。[6] 湯氏之死及對其的悼念，標誌著江南各地文人開始聚焦於同仁的死亡與劇烈的事變。隨著咸同兵燹的到來，繼明清易代之後，又一個“詞史”寫作蔚爲壯觀的時代驟然來臨。

趙起在撰寫《八聲甘州・弔湯雨生將軍》之後，自己也遭遇了骨肉之變。半年之内，他的長子、老母、大兄相繼去世，“萬事本空幻，況值亂離秋”（《水調歌頭》其三），個人悲劇疊加滄海横流的時局，促使他又接連創作了《滿江紅・弔金陵》、《滿江紅・弔潤城》與《滿江紅・弔維揚》，感歎三疊，“歎衣冠文物，盡歸塵劫”，“歎連遭兵燹，十年而已”，“較當年十日，更增淒切”。[7] 趙起直面社會現實，用自己的詞筆展示了當時的戰爭歷史。[8]

孫超用詞筆記録戰爭進程，他選擇的題材諸如“聞揚州失守”、“聞金陵失守”等也關涉到江南重鎮的得失，《青門引・聞金陵失守》批評守軍説：“將不知兵，士多失伍，枉説河山鞏固。”[9] 姚輝第《高陽臺・題張子和明府〈耔荷山莊詞集〉後》描寫戰後金陵之凋敝，自注稱：“君所居陶谷，爲金陵名勝，嗣經粤匪燬劫，已成墟矣。”[10]這裏提及的陶谷，還有湯貽汾的琴隱園、袁氏之隨園等金陵城中士林勝地，皆在戰爭中化爲廢墟。

同治四年（1865）前後，陸初望讀到前揭袁起詞稿，感慨“十年兵火詞人老”（《齊天樂・題袁竹畦參軍胥江游草》）。由此，他寫下《喝火令・追述》六首，第四首下片“太息沉淵，太息戟矛戕。太息更填溝壑，回首淚千行”所感慨的是其親友或投水而亡，或不屈加刃，或死於逃難途中的種種悲劇。自注記録：“庚申四月初六午刻郡城破，陰霾蔽空。”、“門生唐檢齋二尹闔門投井；張伯鳴茂才投河死；親友赴水者尤衆。”、“襲少白、家遵甫兩茂才以不屈飲賊刃。”、“家靜庵

6 《清詞史》論湯貽汾之死，稱：“當時大江南北詞人名宿與他多過從極密。……湯氏之死，曾引起詞壇大震動，悼詞哀辭可以集一大疊，其實是幕大悲劇。”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523。

7 張宏生：《全清詞・嘉道卷》，册 20，頁 672、680—681。

8 參見張宏生：《時代變局與詞史書寫——太平天國戰爭與趙起的詞體創作》，《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3 期，頁 125。

9 張宏生：《全清詞・嘉道卷》，册 21，頁 100。

10 同上，册 29，頁 566。

孝廉、門生姚聖眉茂才均以播遷憔悴而死。”這首詞不僅悼念親友,上片還描寫了作者所見揚州百姓的逃難情況,“但見焦頭爛額,晝夜竄江鄉”。自注記録“其無舟者以破板作筏,横流而下”,[11]可謂九死一生。

李光治的《十六字令》其四也寫揚州戰事,作:“空。砲火驚天旦夕轟。三更夢,血染蜀岡紅。”自注:“揚州駐兵數萬,屢爲賊匪劫營,弁兵死者無算。”他的《浣溪沙・傳聞官軍將復蘇常》則在自注中解釋蘇、常戰局艱難的原因,稱:“總統張公自閏三月初七與賊血戰,惜張玉梁、馬德昭等均爲何制軍留保常州,屢調不至,又餉缺數月,逮十五日賊乘風雪潰圍出。”並在自注中記録戰事的進展,稱:“聞欽差大臣新任制憲曾公令總兵楊載福趨常州,張玉梁亦于二十日趨蘇州,會攻無錫。”[12]

張炳堃的《鶯啼序・歸安定八妹輓詞,兼題其〈餞月樓遺稿〉》記叙了蘇州戰事下其家庭的不幸遭遇,作:“軍書迭報,戰鼓旋催,歎倉黄東渡。(咸豐庚申,賊陷吾郡,予家分寓松江東境。)知多少、嬌鶯稚蕙,陌上塵委,逐浪飄萍,辭條斷絮。”[13]戰爭的衝擊下,張炳堃與“弟兄姊妹”無奈分散,弟弟竹筠更是在流離周浦時身故。像他這樣往松江方向逃難的蘇州民衆,又有多少人最後能“生還重問吾土”呢?而章樹福的《明月逐人來》則記録了咸豐三年中秋節時他聽聞的戰爭進展,詞句“六張五角,誰把疑團破。待聽明朝街語”,自注解釋説:“時嘉定、寶山、上海、南匯、川沙、青浦被陷,是夕始聞官軍殺賊太倉。以道阻,猶未得實。”[14]可知當時逃難到松江一帶者也生活在恐懼之中。

在咸同兵事的主戰場江南地區之外,兩湖、兩廣、江西、河南、天津等周邊地區也發生過激烈的戰事。唐壎與周憲曾、李榘、陶履誠是道光二十六年鄉試同年,後來周憲曾任職天津,陶履誠任職開泰,李榘任職孝感。戰火來襲後,周憲曾死於獨流,陶履誠死於貴州山區,李榘則死於孝感。面對三位故友的凋零,唐壎在《水調歌頭・追弔周蔭芝憲曾司馬、李紫藩榘、陶碩卿履誠兩大令同殉粤

11　陸初望:《懷白軒詞鈔》(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卷二,頁 10b—11b。
12　張宏生:《全清詞・嘉道卷》,册 23,頁 310、314—315。
13　同上,册 29,頁 486。
14　同上,册 25,頁 389。

匪之難》中悲慨地寫到:"記唱大羅曲,笙磐許同音。(道光丙午應京兆試,與三君始訂交。)天涯一霎分手,如鳥各投林。……回首嘯歌處,腸斷帝城砧。"[15]

曹星平長期居住在江西,他在《百字謠・陳邑慱殉難詞》刻畫了萍鄉教諭陳彤燮能夠"教諭"他人,卻在教育自家孩子時有些"束手無策"的生動形象,作:"猶記君住西齋,課兒心切,向我求標準。"自注:"命仲子蘭田從事,後亦進學。"兵鋒來襲,其他萍鄉官員早已逃之夭夭,"恨殺同官,東奔西竄,各署無人影",陳彤燮卻在危難時刻展現出過人的勇氣,"偏是心腸生鐵鑄,萬死不移剛勁。"[16]曹星平用樸實的詞作真實地再現了一位普通文人在生活中的焦慮與在變局中的堅定。

張應昌描寫滕王閣及明妻妃墓周邊皆毀於戰火之事,説:"燒盡了,江村樹。吹淨了,沙堤雨。賸平臺廣砌,一丘全露。"[17]黄燮清的《惜餘春慢・周子因遠客江右,感時惜别,愴觸於懷》也寫到滕王閣的焚毀,詞作:"誰信前游後游,滕閣斜陽,亂離曾見。歎茫茫塵劫,不堪重省,戰場詞卷。"自注解釋説:"予前客江右,值重建滕王閣落成,與宛平錢小南各賦《浪淘沙慢》一闋,韻坡徐君書稿勒石,頃被兵火,度烏有矣。"[18]滕王閣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方重建落成,至咸豐三年(1853)又被兵火焚毀,黄燮清"前游後游"三句即感慨於此。

劉楚英於咸豐八年擢梧州府知府,在任期間,也用《百字令・陽月官軍收復山澤,班師經梧,上張粤卿中丞》、《賀新郎・送蔣燕齋廉訪澤春收復山澤後由邕旋桂》[19]兩首詞作記録了咸豐八、九年間(1858—1859)梧州地區的戰事。

徐大鏞《金縷曲》二首描寫捻軍到來河南時,官兵的顢頇無能,説:"過睢涣、自今伊始。不見一兵和一將,任長行、如入無人地。"他的《風流子》描寫河南一帶遭到盗賊、洪水、兵燹、暴税的反復蹂躪,上片作:"天下半滔滔。思高蹈、無地可誅茅。看上下兩江,伏戎於莽,東南一帶,群盗如毛。自來此、河防三度潰,(道光二十三、四年,祥符、中牟相繼決口;咸豐六年,蘭儀決口;杞縣均被

15 張宏生:《全清詞・嘉道卷》,册 24,頁 340。
16 同上,册 8,頁 497—498。
17 同上,册 18,頁 566。
18 同上,册 26,頁 276。
19 同上,册 29,頁 385—386。

災。)兵燹兩番遭。(咸豐三年,粵匪竄入城内。本年捻匪又復滋擾。)賦重民貧,原非樂土,風聲鶴唳,更屬危巢。"[20]

謝章鋌説趙起詞作:"雖其詞未必入勝,然亦亂離之時能詞者應有之言。"[21]類似的"應有之言"其實並非遲至咸同時期才出現,但此期的規模無疑更加龐大。在前揭二十幾位作者之外,至少還有徐漢蒼、黄之駉、顧淳、喬守敬等五十多位詞人曾使用直賦其事的手法進行"詞史"寫作,可預估這是一個規模在百人左右的龐大創作群體。這批詞作在反映咸同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廣度、深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22]

對咸同兵燹及其影響的描寫,在清詞史上形成了一個重要節點。[23] 直抒胸臆或直書其事的"詞史"作品在這一時期於作家隊伍和作品數量兩方面都占據主流,但除了謝章鋌予以表彰之外,並未得到太多重視。後世甚至誤認爲此期以興寄式"詞史"寫作爲主導。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應該從詞學理論與批評的角度予以考察。

二、被重塑的咸同"詞史"寫作

前揭咸同時期所出現的大量直賦式"詞史"作品並不是在常州詞學"詞史"觀念指導下進行的創作。

張惠言於嘉慶二年(1797)提出"意内言外"之説,强調以"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方式"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經周濟發展,進一步提出了以興寄手法爲主要特徵之一的"詞史"理念。

20　張宏生:《全清詞・嘉道卷》,册 20,頁 267—268。

21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 4 册,頁 3530。

22　參見張宏生:《戰亂、民瘼與文圖記憶——論余治〈江南鐵淚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5 期,頁 10。案:在拙文論述的"直賦式"和"興寄式"作品中,小令、中調、長調均有不少作品,未見明確關聯。"詞史"寫作的主要手法是否與選用詞調有關,是一個值得繼續觀察的問題。《戰亂、民瘼與文圖記憶——論余治〈江南鐵淚圖〉》第三節揭示了余治《江南鐵淚圖》全用《西江月》一調的原因在於"俗調"有利於其"庶民教化"的創作動機。這一研究爲"詞史"寫作研究中的詞調考察提供了示範。

23　參見張宏生:《詞史、興寄與時代——太平天國戰爭前後詞壇創作的理論自覺》,《中華文史論叢》2022 年第 3 期,頁 367。

周濟希望詞人不再表現“陳陳相因”的“離別懷思，感士不遇”等個人情緒，轉而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社會現實，表達對時局的見解與關懷。具體來看，周濟舉了四種“盛衰”之下的“由衷之言”爲例，“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飢，或獨清獨醒”，即對時勢的預判，對危機的揭露，對百姓的同情與士人的獨立精神。而詞人關注的“事”與思索的“理”，或許應寄托在以温、韋詞爲範式的詞情之下。這種重視“由衷之言”的“詞史”觀與重視“紀事”的“詞史”觀有所區别。常州詞學認可的“詞史”寫作應當以比興寄托爲標誌，是與“詩史”相比能夠“自樹一幟”的“詞史”。[24]

周濟的“詞史”觀念載於《介存齋論詞雜著》，附於《詞辨》，有一個逐漸流傳開來而被接受的過程。《詞辨》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潘曾瑋刊行，開始産生影響。至同治十二年（1873）潘祖蔭刊刻《宋四家詞選》後，《詞辨》也隨之引起較爲廣泛的關注。譚獻獲得《詞辨》便在此年九月。張鳴珂受譚獻囑托，借抄《詞辨》一册。寄至後，譚獻立即批閲，並在卷末題跋：“同治癸酉重九，風雨愁飲。張子公束自吴門寄《詞辨》寫本至，研朱點勘，終卷已鐙上矣。”[25]譚獻正式開始編纂《箋中詞》始於光緒三年（1877），[26]因此《箋中詞》中的“詞史”觀念可以確認受到了周濟“詞史”觀的影響。

譚獻以外，丁紹儀、杜文瀾等詞學家對周濟詞學皆不陌生，他們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常州詞學影響。[27] 咸同兵燹導致大量文人死亡，不少文獻被毁，丁紹儀、杜文瀾、譚獻等深受常州詞學“詞史”觀念影響的詞學家在搶救詞籍，[28]以及編纂詞話、詞選的過程中，通過對時人詞作的選編與闡釋，重塑了咸同時

24　周濟著，段曉華輯校：《周濟詞集輯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44。

25　周濟：《詞辨》（上海圖書館藏同治十二年［1873］鈔本），不分卷。

26　參見吴欽根：《譚獻稿本日記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22 年），頁 67。

27　朱惠國認爲譚獻是周濟以後常州詞學的代表人物。參見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10。孫克强認爲丁紹儀與常州詞學的比興寄托觀有同有異，相異之處主要在於丁紹儀肯定私人情感，而張惠言偏執於社會政治。參見孫克强：《丁紹儀詞學批評論略》，《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54 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年），頁 526—527。沙先一認爲杜文瀾對常州詞派的理論主張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尤其推崇周濟《宋四家詞選》與《詞辨》。參見沙先一：《清代吴中詞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57。

28　參見任軻：《咸同變局與詞壇新動向》，《文學遺産》2024 年第 2 期，頁 140—142。

期"詞史"寫作的面貌。

戰爭發生後,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和《國朝詞綜補》裏記録了大量江南家族在咸同兵燹中家破人亡的情況。其中,他自己的家族中就有數十人"或身膺白刃,或縊,或投水,非先期遠避者,均相率就義"。[29] 丁紹儀在戰爭期間居官福建,閩地亦刀兵滿路,他也是咸同兵燹的親歷者和受難者。

但是,他卻無意擇取過多直接記録戰爭的作品。例如前揭趙起詞作。丁紹儀著重記録了趙起在戰爭期間的表現,而《聽秋聲館詞話》和《國朝詞綜補》所選趙起詞作卻皆與戰事無關。又如唐壎詞,丁紹儀在《國朝詞綜補例言》中提到唐壎的幫助,説他"咸裒所見以示",[30]其中應該也包括唐壎自己的衆多"詞史"作品。然而《國朝詞綜補》選了唐壎十二首詞,皆無關時事。從這一現象可以窺見丁紹儀在選詞時的策略。

胡鑑在《聽秋聲館詞話跋》中提到"托興遥深,是之取爾"。[31] 詞中興寄當是丁紹儀選詞論詞的重要標準之一。《國朝詞綜補》選録了吴熙載的《摸魚兒・癸丑七夕,寓邵伯埭作》與范淩鼞的《摸魚兒・癸丑七夕,和吴讓之》。[32] 兩首作品都在詞題中點出"癸丑",提醒讀者詞意與戰爭有關,而這兩首詞作的表現方式也與前揭直賦式"詞史"作品有明顯區别。詞題皆寫"七夕",吴詞點出在"雙星未識人間世,今夕那同前度"的特殊時局之下,牛女之間已象徵著生離死别,"空階指著同生死,要與證盟休負"。今生雖誤,但心意仍堅,"任海水枯時,昆池劫盡,難謝此心苦"。范氏的《摸魚兒》接過"今夕那同前度"的話頭,反過來説:"銀河自昔傷離甚,豈獨今年牛女。"但今年又如何呢? 范氏接著説:"悵十里、揚州無復陳瓜處。"、"隋堤路,鬼唱秋墳黄土。"暗示揚州遭受了戰爭的破壞。"當時枉自歌舞。生離死别須臾耳",表達了他對生離死别的慘痛認知。這種今昔對比下的傷痛,還體現在《國朝詞綜補》所選吴熙載的另一首《金縷曲・癸丑九月,詠柳》中。

29　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3,頁 2646。
30　丁紹儀:《清詞綜補・附續編》(北京: 中華書局),冊上,頁 3。
31　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3,頁 2841。
32　丁紹儀:《清詞綜補・附續編》,冊中,第 708 頁;冊下,第 1227 頁。

咸豐三年九月，欽差大臣琦善統領江北大營已包圍揚州城近半年，期間不乏主帥耽於享樂、擁兵自重、與屬下不和的傳聞流出。“上以琦善久攻揚城不克，旨斥老而無恥，且曰如再不知愧奮，朕必用從前賜賽尚阿之遏必隆刀將汝正法。”（《中興別記》卷九）[33]《金縷曲・癸丑九月，詠柳》下片連用周亞夫細柳營、《詩經》中遣勞使臣諸篇、齊武帝靈和殿楊柳喻重臣、屈原漁父詞不肯同流合污等典故，譏諷清軍重利無恥，表達對局勢的悲觀預期，整首作品可謂“刺詞”。

這首《金縷曲》的表現方式與蔣春霖在同年寫下的《踏莎行・癸丑三月賦》相似。《踏莎行》“斜陽雙燕欲歸來，捲簾錯放楊花入”一韻，“楊花”指楊秀清軍隊；[34]“雙燕”當指金陵被圍時，沿水路來救的向榮軍隊與沿陸路而來的琦善軍隊。兩軍在趕往金陵的途中收到了金陵城破的消息，後分別建立起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隨後，起義軍勢如破竹，連下鎮江、揚州兩座重鎮，“東風一夜轉平蕪，可憐愁滿江南北”可能是就此而言。針對這首《踏莎行》，譚獻評價：“詠金陵淪陷事，此謂詞史。”[35]吳熙載的《金縷曲》和蔣春霖的《踏莎行》都是典型的興寄式“詞史”作品，《踏莎行》也被選入了《國朝詞綜補》。[36]

在詞題之外，小序和自注可用來明確作品的“詞史”意義。[37] 徐漢蒼的《碧琅玕館詩餘》中有一首《鷓鴣天》，充分利用了小序、自注的紀事功能來明確作品的“詞史”意義。小序稱：“開府江忠烈岷樵先生忠源守城日，命地方官偕予

33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太平天國史料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年），冊 1，頁 350。

34 參見蔣春霖撰，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36。

35 譚獻：《篋中詞》，今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冊 1732，頁 683。

36 同一位詞人也可能會在不同詞作中分別採用直賦其事或比興寄托兩種不同的表現方法來進行“詞史”寫作。如上文中的吳熙載《摸魚兒》、《金縷曲》都屬於興寄式“詞史”，而《國朝詞綜補》裏還收了他的一首《揚州慢・咸豐三年十二月入揚州郡城作》，則用較爲直接的表述方式記録了他眼中的蕪城以及心中的感慨。另外，蔣春霖也有“詞史”作品以“全是賦體”的筆法取勝。在吳、蔣兩家之外，至少還有陳元鼎、徐宗襄、關達源、江順詒等詞人筆下兼具兩種表達方式的“詞史”作品。

37 陶樑很注重用小序來交代詞作的創作背景，在詞集中兼具編年之效。丁紹儀稱其“舉生平境遇，自繫以詞。寓編年紀事於協律中，實爲詞家創格”，並認爲其中包含了“可作詞史讀”的作品。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3，頁 2722—2723。

籌款。城破之日,忠烈殉節,予身被重創。想先生激烈之情、謙抑之度,而青袍淚濕矣。”詞中“三春心緒總模糊”句下有自注:“予卧傷九十日。”[38]從小序可知這是一首關於江忠源殉節的詞作。杜文瀾編纂《憩園詞話》時讀到了《碧琅玕館詩餘》,他從中僅擇取這首《鷓鴣天》收入詞話,並將小序與自注中的内容從詞中抽離出來,作爲對徐漢蒼生平事蹟的介紹文字。介紹以後,詞話作:“有鷓鴣天詞云:‘卧病空山日未晡。三春心緒總模糊。夢中喬木都非故,燕子何常識舊廬。　香已燼,酒難沽。樓臺遺恨變邱墟。曾邀開府親籌策,晞髮衰翁痛不如。’即詠失城事也。”[39]杜文瀾將徐漢蒼《鷓鴣天》詞采入詞話時抽離小序與自注的這一改動,讓詞話版本的《鷓鴣天》詞自主明確“詞史”意義的能力被削弱,而讀者獲得了建構其“詞史”意義的空間。由此,杜文瀾對作者原意稍做偏離,將詞作主旨闡釋爲“詠失城事”,與譚獻對《踏莎行・癸丑三月賦》的評語竟有幾分相似。

譚獻的《篋中詞》,今集卷四評論王憲成《揚州慢》爲“杜詩韓筆,斂抑入倚聲,足當詞史”,[40]肯定了直賦式“詞史”寫作。但並不是每一首直抒胸臆的“詞史”寫作都會得到他的肯定。譚獻於光緒二年閲《國朝詞綜續編》,評嘉慶詞壇:“俳諧之病已淨。即蔓衍闡緩貌似南宋之習,明者亦漸知其非。”出現這種改變的原因,譚獻將之歸結於周濟,一在於“清真、夢窗、中仙之緒既昌”,二在於“周介存有‘從有寄托入,以無寄托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41] 建立在這種詞學思想上,譚獻在翌年開始的《篋中詞》編纂中,對《國朝詞綜續編》所收諸可寶詞做了一個有趣的揀擇。

《國朝詞綜續編》卷二一收録了諸可寶詞六首,其中《鶯啼序・舟次紀感,時官軍初下金陵》是一首直賦式“詞史”作品,記録了咸同兵燹對詞人造成的傷痛,“十年裏、殘劫紅羊,舊時豪傑何處。蚤枯支、埋沙萬骨,更顱血、縈刀千縷。……天涯倦客,少小曾游,認昔年故步。奈兩度、劉郎來到,望眼淒清,巷陌

38　徐漢蒼:《碧琅玕館詩餘》(清光緒二年[1876]刻本),不分卷,頁 3b—4a。
39　唐圭璋:《詞話叢編》,册 3,頁 2926—2927。
40　譚獻:《篋中詞》,今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册 1732,頁 672。
41　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北京: 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5—66。

堆蓬,板橋髡樹”。[42] 這樣一首“詞史”作品在《國朝詞綜續編》裏可謂僅見。但是譚獻不予收録,而選擇了諸可寶的另一首《浣溪紗》,並評“宕逸”。詞作:

> 舊恨新愁兩不饒。人間何事只魂銷。寸牋難寫盡難描。　酸入天心梅子雨,信回江口雪花潮。小樓排日盼歸橈。[43]

“舊恨新愁”一句化用張掄《霜天曉角》詞句“舊恨無處著,新愁還又作”,《詞綜》稱張掄“南渡故老”,[44]可知其人亦經歷了盛衰劇變。“人間何事”一韻可能源自南唐中主與馮延巳“干卿何事”典故,化用王士禛《踏莎行・秦淮清明》中語“驀地愁來,干卿何事。梁陳故蹟消魂死”。[45] 這樣用典既承接了前一韻中的“愁”字,又暗示了“魂銷”與秦淮之間的關聯。結尾“盼歸橈”點出不能歸鄉的困境。這首《浣溪沙》的寄托在有無之間,雖然不能直接目爲興寄式“詞史”作品,但具有這樣解讀的可能性。

在丁紹儀、杜文瀾、譚獻等編撰的詞選、詞話中,咸同“詞史”作品經過揀擇與闡釋,以比興寄托爲主要表現手法者得到了彰顯。[46] 這可謂常州詞學影響咸同“詞史”寫作面貌重塑過程的一個方面。而這一重塑過程受到的影響,還有更深遠的一面,即對戰前詞作“詞史”意義的闡釋。

42　黄燮清:《國朝詞綜續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1,頁 646。

43　譚獻:《篋中詞》,今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691。按:諸可寶《璞齋集》五卷本刻於光緒十四年(1888),有詩四卷、詞一卷。另據譚獻日記稿本,譚獻於光緒十五年(1889)二月讀到諸可寶《璞齋集》。參見吴欽根:《譚獻稿本日記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22 年),頁 99。但是,《篋中詞》今集刊於光緒七年(1881),加之卷五“諸可寶”名下未標别集名稱,可推斷譚選諸詞的選源不是别集,而是選本。

44　朱彝尊、汪森編,孟斐標校:《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卷 12,頁 185。

45　鄒祇謨、王士禛:《倚聲初集》卷一〇,《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9,頁 321。

46　以《國朝詞綜補》爲例,其中收録與咸同兵燹有關的直賦式“詞史”作品約 67 篇,興寄式“詞史”作品約 53 篇,規模相差不大。考慮到當時直賦式“詞史”作品數量遠多於興寄式“詞史”作品的實際情況,加之如丁紹儀收孫超、趙起、唐壎、張景祁等人詞作時不收“詞史”作品的選擇方式,可以推斷丁紹儀有意識地控制了直賦式“詞史”作品在《國朝詞綜補》中的數量。另一方面,因筆者學識有限,對很多作者的生平事蹟掌握不足,可能解讀不出其詞作中的“感事”寄托。因此興寄式“詞史”作品或許比筆者初步統計的更多。當然,這種基於主觀解讀的統計只能作爲參照。

三、對"承平時語"的"詞史"解讀

周濟"詞史"觀强調詞人對"盛衰"的"感慨"。生命的凋謝與戰場的烽煙固然是"盛衰"的劇烈表現,容易引起詞人"感慨"。但是,"綢繆未雨"、"太息厝薪"者往往能洞察時勢的變化,預見世變的降臨。上一節討論了詞學家如何處理戰爭中或戰後帶有創傷痕跡的詞作。那麼,當他們回顧戰爭發生前的詞作時,又會如何處理呢?

咸豐四年(1854)潘曾瑋《玉泠詞》刊行,有自序稱:"余弱冠即學爲詞,當時儕輩謬相推許,輒自矜惜。及見張皋文、翰風兩先生《詞選》,讀其所爲序,乃悟向之所作如滅燭夜行,雖馳逐畢生,不離幽室。今而後始識康莊也。……余幼時之作十不一存,道光乙巳,張仲遠太守曾録三十首刊入《同聲集》中。今編自癸卯至癸丑十年中所作共百首,名爲《玉泠詞》,屬蔣子研詒書而付梓,以就正海内同志者。"[47]吴中詞壇是常州詞學影響力得以擴大的一個重要節點,潘曾瑋曾刊周濟《詞辨》,在序言中稱述"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之論。[48] 此後,他又將周濟的《宋四家詞選》交與潘祖蔭刊行。潘曾瑋自述讀《詞選》後"始識康莊",還暗用了周濟自述詞學經歷的話頭。可以推測,潘曾瑋受到常州詞學影響後,曾删定過自己的詞集。[49] 今存《玉泠詞》最早的一篇詞序爲姚燮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所作,可以推測潘曾瑋最遲於道光二十四年初曾編訂過詞集的稿本。被張琦之子張曜孫采入《同聲集》的《玉泠詞》三十首當從該稿本中來。《同聲集》還收入了一篇"徐子陵"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針對集中七首《菩薩蠻》創作的序文。多年後,杜文瀾在編撰

47　潘曾瑋:《玉泠詞》(清咸豐四年[1854]刻本),不分卷,頁 11a—11b。

48　周濟:《詞辨》,《續修四庫全書》,册 1732,頁 575。

49　根據張炳堃的《浣溪沙・玉泠以北行詞〈浣溪沙〉四十闋見示,遂同其調奉題》,可知潘曾瑋曾作《浣溪沙》北行詞四十首,但咸豐四年本《玉泠詞》未予收録,可證潘曾瑋此次選刊"百首"之嚴。張炳堃以詞論詞,形容潘氏北行詞爲"杜陵重賦北征篇",暗示了四十闋詞作的風格。張宏生:《全清詞・嘉道卷》,册 29,頁 467。

《憩園詞話》時見到了咸豐四年本《玉泠詞》,[50]其中也有這篇序,署名徐子苓,稱:

> 故自《狡童》諸篇而下,次之以《風雨》。《風雨》者,思賢也。詩亡而騷作,騷亡而漢氏樂府出。……是以讀《詩》不得其解,則以爲淫;讀《騷》不得其解,則以爲譎;讀漢氏樂府不得其解,則以爲質而俚。太常潘子季玉工古文、詩,以其暇爲詩餘若干首。余受而讀之,其冠於篇首有所謂《菩薩蠻》七首者,肇端房闥之近,叙恨睽隔之交,其愛也似媟,其怨也如慕。嘗紬繹其旨而不得,因以質於季玉。季玉悄然曰:"有是哉,子之固也。余偶有觸焉,而於詞焉寄之,又烏知後之讀吾詞者不以爲淫焉、譎焉、質而俚焉否耶?余亦於詞焉寄之已矣。有是哉,子之固也。"其詞總名《玉泠集》,陽湖張仲遠采刻《同聲集》中,元和陳良叔重爲之序,初無待余言,顧獨此七首者,余思之,余重思之,而卒無以解其旨之所在,則甚矣余之固也,故稱《詩》以問之。[51]

徐子苓閱讀《玉泠詞》三十首,認爲七首《菩薩蠻》志隱義微,思之又思,仍不得其旨,故詢問潘曾瑋。[52] 潘氏雖然回答説"有是哉,子之固也",看似否定了寄托,但實則在"烏知後之讀吾詞者不以爲淫焉、譎焉、質而俚焉"的反問中承認了有所寄托。這樣的答覆,與周濟在《宋四家詞選序論》中提倡的"夫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53]可謂合契。這七首詞作的主題是相同的,即思遠

---

50 《憩園詞話》討論了潘曾瑋的《如此江山》(天涯休怨同心少)和《憶舊遊》(記香天跨蝶),這兩首詞作收入了咸豐四年本《玉泠詞》,而未收入《同聲集》本《玉泠詞》。

51 馮乾:《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册 2,卷八,頁 818—819。

52 當咸同戰事爆發後,徐子苓與潘曾瑋屢有書信往來討論局勢,其文集收録了四封《與潘季玉書》。在書信中,他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潘氏兄弟在蘇督辦團防的風險,並分析向榮江南大營"輕敵則易敗",蘇州"患形亟矣"。他又曾在"纔脱虎口,驚惶病憊"的情況下,就潘氏泰西會防的主張感慨"益以知足下今者之所遭又死生進退出處之俱難"。但他坦言此爲奇兵,須"加以戒慎"。徐子苓:《敦艮吉齋文鈔》卷二,《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册 649,頁 605—606、624、629—630、631。

53 周濟著,段曉華輯校:《周濟詞集輯校》,頁 148。

人。有趣的是《憩園詞話》對這七首作品的處理。杜文瀾先用了較多的篇幅介紹潘曾瑋的仕途以及在咸同時期的功績,稱讚其"力保上海",又述英將戈登"幾爲變"時,潘氏"急棹小艇躬往説之,理喻萬端",化解了矛盾。在文學上,杜文瀾稱潘氏"尤專心於意内言外之學",後録《菩薩蠻》七首並評論説:"此七闋寄托遥深,纏綿宛轉,與握蘭金荃集之二十首,同一機杼。其前後結第三字均用平聲,尤得方山尉遺意。"[54]杜文瀾有意無意忽略了詞作的創作時間,而從詞旨"寄托遥深"、詞情"纏綿宛轉"、詞律平仄謹嚴三個方面强調了七首作品與温庭筠詞的相似性。這樣的處理方式容易讓讀者産生七首作品與咸同兵燹相關的聯想。

譚獻在《箋中詞》中也收録了這七首作品,記:"徐子陵序略曰:肇端房闥之近,叙恨睽隔之交,其愛也似媟,其怨也如慕。余思之,余重思之,而卒無以解其旨之所在。"評:"鉤鑲斷續,聲情相副,末章特開異境,乃不爲金荃所囿。"[55]譚獻稱"徐子陵",依據的應當是《同聲集》本,他借用序中語肯定詞中有所寄托。譚獻通常用"鉤鑲"一詞描述詞句之間意脈緊密,但這裏的"鉤鑲斷續"應該是指七首之間有似斷實連的篇章關係。譚獻更高明的地方在於點出"末章特開異境,乃不爲金荃所囿"。[56] 其七作:

> 鄰家同戍遼陽轉。昨宵猶説瓜期緩。底事苦淹留。憶君愁復愁。　香銷銀篆冷。恨也無人省。夢影不分明。月華何處清。[57]

七首之間具有層層遞進的關係,其一寫女子想象"相見定成歡。此時明月圓";其二寫"覺來驚曉寒";其三寫"登樓一望傷心碧";其四寫"時光虚度如流

54　唐圭璋:《詞話叢編》,册 3,頁 2883—2884。
55　譚獻:《箋中詞》,今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册 1732,頁 677—678。
56　《箋中詞》今集六卷於光緒五年(1879)編定,《憩園詞話》於光緒十年(1884)才完成校抄。因此譚獻與杜文瀾的看法可謂不謀而合,他在這裏點出第七首"不爲金荃所囿",恰恰也是承認前六首有意追尋温庭筠。
57　潘曾瑋:《玉泠詞》(清咸豐四年刻本),不分卷,頁 2b。

水";其五問"何日是歸程";其六寫無處問,因爲"迢迢萬里音書斷"。[58] 其七將這份思念發生的主體推展到"鄰家"身上,對遠人不歸的幽怨不再是某個具體人物形象的情緒,而成了普遍的情形。當"瓜期緩"的消息傳來,望君歸來的癡心由熱轉灰。第一首所寫"芙蓉帳外燒銀燭。畫屏雙坐人如玉"的幻境被第七首所寫"香銷銀篆冷"的現實所擊碎。"月華何處清"的疑問再次將絶望的情緒普遍化。潘曾瑋的感慨不是針對一人心事,這或許是譚獻特别看重第七首的原因。[59]

譚獻在《篋中詞》刊刻後,有感於此前對丁紹儀選詞不夠重視,很快便開始補訂續編。在續選中,他對《國朝詞綜補》和《聽秋聲館詞話》都予以了參考。《聽秋聲館詞話》卷六有一則輯録《翠微花館詞》中的同人唱和詞,其中輯録了一首附於《翠微花館詞》卷一〇的沈沂曾《齊天樂・秣陵秋感》。這首詞亦見於《國朝詞綜補》卷三〇和《篋中詞》今集續卷一。[60] 沈詞約作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61]當時尚未發生劇烈的社會變化,但詞作卻渲染出一片蕭瑟之感。從表面來看,沈沂曾記録了自己於秦淮河畔訪伎不遇之事,其中層層感慨,似乎又不局限於個人情事。詞中用語多從姜夔《暗香》、《齊天樂・蟋蟀》和周密《玉京秋・秋思》中變化而來,而"山髻青青,六朝金粉賸多少"一韻在經歷了咸同兵燹的讀者看來,仿佛預知了金陵的殘破。

類似這首《齊天樂》的作品,《國朝詞綜補》和《篋中詞》皆選的還有龔自珍的名篇《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論者多强調這首詞以比興寄托的方式描寫了小人得意、賢士失志的衰敗圖景,諷刺清王朝的腐朽無能。丁紹儀在《聽秋聲館詞話》的最後寫道:"然作者不宜如此,讀者不可不如此體會。因思南宋末

58 潘曾瑋:《玉泠詞》(清咸豐四年刻本),不分卷,頁 1a—2a。

59 《國朝詞綜補》也選了七首中的第三首和第七首。

60 丁紹儀:《清詞綜補・附續編》,册中,頁 561。這首詞附於《翠微花館詞》卷一〇,亦收入沈沂曾自己的詞集《瘦吟詩餘》,詞牌皆作《臺城路》。《聽秋聲館詞話》、《國朝詞綜補》和《篋中詞》收入這首作品,詞牌皆作《齊天樂》,可知譚獻應當是從丁選中將沈詞補入《篋中詞》。

61 在《瘦吟詩餘》中,這首詞的前一首詞題作:"丙子七月十七日,偕吴侶棠夜泛秦淮……"丙子即嘉慶二十一年,這首"秣陵秋感"可能作於一時。沈沂曾:《瘦吟草》(1942 年鉛印本),卷三,頁 10B。

季,士多憫世遺俗,托興遥深……"[62]譚獻則在《復堂詞録自叙》中説:"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擬議之窮,而喜怒哀樂之相發,嚮之未有得於詩者,今遂有得於詞。"[63]丁紹儀與譚獻在閲讀《齊天樂・秣陵秋感》、《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這類作品時,或許正發揮了讀者建構詞作意義的主動性,[64]從"托興遥深"的角度解讀出具有"自樹一幟"意義的"由衷之言"。杜文瀾也曾感慨類似作品"此是承平時語,今風聲鶴唳,銷魂情緒,殆又過之"。[65] 丁紹儀、杜文瀾、譚獻等人在兵燹之後,再讀嘉慶、道光年間"承平時語"的詞作時,一些特殊的意象能激起他們心中的傷痛,從而對詞作作出"不可不如此體會"的解讀。他們發展了常州詞學"詞史"觀,進而在批評實踐中肯定並建構起這些作品"綢繆未雨"、"太息厝薪"的"詞史"意義。

四、咸同"詞史"寫作的經典化

前文勾勒了《聽秋聲館詞話》、《國朝詞綜補》、《憩園詞話》、《篋中詞》等詞學文獻對咸同"詞史"寫作面貌的重塑,其在清末民國詞壇産生影響的媒介主要是《篋中詞》。[66]

《聽秋聲館詞話》和《國朝詞綜補》影響了譚獻對《篋中詞》的編選。《國朝詞綜補》早在同治二年(1863)就有初稿本,光緒十年刻四十卷本,光緒十三年(1887)之前增刻十八卷,合刻爲五十八卷本。當年,還有十八卷編成未刊。上述版本譚獻皆曾閲讀。[67]《聽秋聲館詞話》刊刻於同治八年(1869),譚獻於同治

62　唐圭璋:《詞話叢編》,册 3,頁 2837。

63　譚獻纂,羅仲鼎、俞浣萍整理:《復堂詞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2。

64　丁紹儀在解讀詞中寄托時有時求之過深。他認爲劉勰的《水龍吟・詠塵》是一首有慨於時事的作品。謝章鋌作爲劉勰至友,在《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中回應了丁氏的意見,説:"無關時事也。"唐圭璋:《詞話叢編》,册 4,頁 3487。學者認爲謝説較爲公允。參見莫立民:《近代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53—254。

65　唐圭璋:《詞話叢編》,册 3,頁 2944。

66　《憩園詞話》長期以鈔本存世,較晚被廣泛閲讀。

67　參見毛盼盼:《論〈清詞綜補〉的成書過程與體例特徵》,《棗莊學院學報》2015 年第 1 期,頁 33—34。

十一年(1872)閱讀一遍,並評價其"宗旨和雅,持論近正",學者指出,這一表述顯示譚獻在論詞宗旨上接受了丁紹儀的影響。[68]《篋中詞》今集六卷於光緒七年刻竣。當年十一月譚獻再閱《聽秋聲館詞話》後,感慨《篋中詞》不可不補訂,並於翌年開始補輯,至光緒二十年(1894)完成續選四卷,光緒二十一年(1895)刻竣。[69] 譚獻在光緒十三年五月初一的日記中記載,僅從《國朝詞綜補》四十卷本録入《篋中詞續集》的就達數十篇之多,另外他還從《聽秋聲館詞話》裏採集了詞作。[70]

總體來看,譚獻編選《篋中詞》的過程中,對丁紹儀著作的接受程度有一個逐漸加深的過程。讓人感到遺憾的是,譚獻同治二年五月初步接觸《國朝詞綜補》稿本時,卻做出酷評,説:"閱無錫丁紹儀杏舲《國朝詞綜補》稿本。揚王昶侍郎之波。集中輩行錯落,聞見淺陋。予所見近人詞多丁所未見。《詞綜續編》,嘉善黄霽青已成數十卷,海鹽黄韻珊繼之有成書矣。"[71]意思是説丁紹儀所見未廣,選詞近浙西家數,對人物生平不夠熟悉,且已有《國朝詞綜續編》在前,丁氏不必復作。這一評價被收入了《復堂日記》與《復堂詞話》中,加之《篋中詞》的巨大影響力,讀者受此影響容易形成負面印象而輕視丁著,十分可惜。[72]

光緒七年至二十一年的十餘年間,既是《篋中詞》續集四卷的編纂期,也是《篋中詞》不斷擴大影響力的時期。同仁向譚獻寄贈、抄示、推介詞籍,是譚獻對當代詞籍的主要獲取途徑。[73] 反過來看,不斷出現的寄贈、推介行爲,也説明《篋中詞》的影響與日俱增。冒廣生稱:"篋中一選,海内視爲玉律金科。"[74]

《篋中詞》在揭示詞作的"詞史"意義方面很有貢獻。卷一、卷四、卷五因分

---

68 參見李劍亮:《論丁紹儀對譚獻詞學闡釋論的影響》,《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頁 146。

69 參見吴欽根:《譚獻稿本日記研究》,頁 70。

70 參見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頁 266。

71 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頁 8。

72 《聽秋聲館詞話》收清代詞人 412 家,詞作 695 首,對於研究晚清詞人詞作其實有重要參考價值。參見譚新紅:《清詞話考述》(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18。

73 參見吴欽根:《譚獻稿本日記研究》,頁 77。

74 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5,頁 4671。

別關涉明清易代和晚清亂局兩個時期,譚獻收録並闡釋了大量"詞史"作品,其中多數是興寄式作品。在卷二所收録的九首陳維崧詞作中,譚獻也選擇了《夏初臨》和《琵琶仙》,分别評價爲:"故家喬木,語自不同。"、"亦似海上未靖時作。"[75]而回避了陳維崧那些直面社會苦難的現實主義作品。

今集卷四收入了不少譚獻用以建構咸同"詞史"寫作面貌的篇章。如項鴻祚《滿庭芳・過皋園有感》與前揭龔自珍《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皆見於此,二者也有近似的闡釋空間。許宗衡《霓裳中序第一・秋柳》可能是同治三年後詞人重回金陵時發出的感慨。譚評:"念亂憂生。"杜文瀾《臺城路・秦淮秋柳》寄托亦在有無之間。前揭潘曾瑋《菩薩蠻》七首和范淩鼕的癸丑七夕詞作都見於此。在范氏詞作後,譚獻再次明確標識了"詞史"二字。郭夔《淡黄柳》從詞句上看不出與咸同戰事相關,卻仍然得到譚評:"金陵陷後作。"黄錫禧《陌上花・紅葉,庚申十月作》有句:"認取荒溝,怕見故宫門掩。"這一用典放在"庚申十月"的背景下,可能暗指清文宗出逃熱河事。姚正鏞《淒涼犯》描寫客子與寒鴉漂泊無依的命運,攝人心魄。譚評:"念亂之言,源於小雅。"[76]

上述作品可視爲卷五蔣春霖"詞史"作品的鋪墊。蔣氏被收録的二十三首作品中,有十四首被譚獻建構起"詞史"意義,且興寄式寫作也多於直賦式寫作。譚獻對蔣春霖"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77]的總評爲讀者群體所熟知,也促使蔣春霖詞代表咸同"詞史"寫作而走上了經典化的歷程。1925年,朱孝臧撰《望江南》:"窮途恨,斫地放歌哀。幾許傷春憂國淚,聲家天挺杜陵才。辛苦賊中來。"[78]1932年《詞莂》刊行,所選蔣春霖詞十首,七首與《篋中詞》相同。朱孝臧作爲清末民初主流詞壇的領袖人物,他對《篋中詞》所塑造蔣春霖"詞史"意義的接受與宣揚,具有特殊意義。

1926年出版的徐珂《清代詞學概論》再次重述了《篋中詞》對蔣春霖"咸豐

75　譚獻:《篋中詞》,今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册1732,頁635。
76　同上,今集卷四,頁675、679—682。
77　同上,今集卷五,頁685。
78　朱孝臧著,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箋注》卷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册下,頁365。

兵事，天挺此才”的論點。[79] 1931 年，劉毓盤《詞史》出版，評價蔣春霖詞“其言情之作，皆感事之篇也”。[80] 1932 年，吴梅《詞學通論》出版，稱：“洪、楊之亂，民苦鋒鏑，《水雲》一卷，頗多傷亂之語。”[81] 1933 年 4 月，《詞學季刊》創刊號刊載《水雲樓未刻詞（軍中九秋詞）》；同年十二月，《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又刊登了唐圭璋《蔣鹿潭評傳》。在《評傳》中，唐圭璋除了復述譚獻之論以外，還將蔣春霖“詞史”寫作的表現形式、詞中情感和詞人之心總結如下：“他的詞，不是激烈的狂喊，而是隱忍的飲泣；一種風塵淪落之感，和無國無家的情緒，都寫得深透無匹；而一腔温柔忠愛的心跡，竟與屈靈均杜少陵如出一轍。”[82] 1936 年，盧前作《望江南》論蔣春霖詞“幾許傷春閒涕淚，可知詞客杜陵無”，[83] 强調其“詞史”意義，爲《清名家詞》的讀者了解蔣春霖提供參考。1941 年，龍榆生嘗試編纂《詞林要籍解題》，就《水雲樓詞二卷水雲樓詞續一卷》編寫傳略；介紹版本；輯録評述，並稱“以譚氏最爲的評”。此外，龍榆生説：“近人評論文學，恒以能表現時代精神者爲極致。吾人對於文藝之欣賞，亦恒因所處之時代環境，與作者有若干相同之點，最易引起同情。……最能表現時代精神者，又當推水雲樓爲首出。”[84] 王蘊章《詞史卮談》也將《水雲樓詞》視爲咸同“詞史”寫作的代表。[85]

重視比興寄托的“詞史”觀在清末民國時期得到普遍接受，此時咸同兵燹帶給人們的愴痛尚未完全平復，而新的混亂又對社會持續造成破壞。受到前揭重視“托興遥深”，强調讀者主觀建構“詞史”意義的闡釋思路影響。《庚子秋詞》代表的清末“詞史”寫作形成了“隱約迷離”的主要風貌。[86] 而《滄海遺音集》則是士大夫詞學將“意内言外”説轉化爲創作上的指引，形成集體性書寫範

79 徐珂：《清代詞學概論》（上海：大東書局，1926 年），頁 3。
80 劉毓盤：《詞史》（上海：上海書店，1985 年），頁 209。
81 吴梅著，郭英德編：《吴梅詞曲論著四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442。
82 唐圭璋：《蔣鹿潭評傳》，《詞學季刊》1933 年第 1 卷第 3 號，頁 32。
83 陳乃乾：《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2 年），册 10，論清詞百家望江南頁 8。
84 龍榆生：《詞林要籍解題》，《同聲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4 號，頁 73—74。
85 參見西神：《詞史卮談》，《同聲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5 號，頁 95。
86 參見郭文儀：《時代變局中的家國書寫與詞風進境——以〈庚子秋詞〉〈春蟄吟〉爲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6 期，頁 37—38。

式的表徵。[87] 就此,廣大讀者不僅接受蔣春霖詞爲咸同"詞史"寫作的代表,而且也格外理解、重視他的創作。深受常州詞學影響的詞學家們所重塑的咸同"詞史"寫作面貌,最終結穴爲蔣春霖詞的經典化。在這個經典化的過程中,興寄式"詞史"不僅取得了與直賦式"詞史"比肩的位置,甚至在讀者心中留下了更爲深刻的印象。

五、結　　語

梳理咸同"詞史"寫作的發生、重塑與經典化過程,可以發現——哪怕是緊密相關的詞學理論,也未必能及時影響到寫作層面。因劇變來臨的突然性,"詞史"寫作以詞壇主流所習慣的表達方式第一時間就展開了,直抒胸臆、鋪陳其事的"詞史"作品顯示出龐大規模。但是,常州詞學也已經在咸同時期擁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學者指出,在鴉片戰爭時期,已有自發運用常州詞學展開"詞史"寫作者,並對咸同"詞史"産生了影響。[88] 故於主流之外,以比興寄托爲主要表現手法的"詞史"作品構成了咸同"詞史"寫作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面對上述咸同"詞史"寫作的實際情況,兵燹之後,以丁紹儀、杜文瀾、譚獻爲代表的深受常州詞學影響的詞學家們,通過編纂詞選、詞話來對燼餘詞籍進行搶救時,其文獻成果重塑了咸同"詞史"寫作的面貌。

譚獻認爲詞體可承載重大的政治社會教育功能,[89]且强調"嚮之未有得於詩者,今遂有得於詞"。他們繼承周濟"詞史"觀念,從詞體本身的特點出發,强調詞的獨特性。首先,他們重視《詞選序》中揭示的"意内而言外謂之詞",突出"詞史"與"詩史"相區别的一面,重視比興寄托的表現方式,注意詞中感慨與時事之間巧妙含蓄的關聯。進而,他們發展出"讀者何必不然"的思路,追溯到

87　參見彭建楠:《〈滄海遺音集〉與清季民初的詞史演進》,《學術研究》2023 年第 10 期,頁 173—175。

88　參見閔豐:《世變的迫力:鴉片戰爭時期"詞史"書寫的新向度》,《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 年第 10 期,頁 11—15。

89　參見譚獻著,方智範編注:《增廣復堂詞話詳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年),第 9 頁。

“承平時語”，發掘詞作中“綢繆未雨”、“太息厝薪”的“詞史”意義。經過丁紹儀、杜文瀾、譚獻的揀擇與闡釋，人們從《國朝詞綜補》、《聽秋聲館詞話》、《憩園詞話》、《篋中詞》來觀察咸同“詞史”寫作時，仿佛既能目睹創痕累累的受難者，又能關懷濃妝淡抹而眉目間透露出身世悲涼、中心愴痛的遲暮美人。

劇烈的事變對晚清詞史帶來的影響有不同層次。在表層上，以湯貽汾爲代表的大量文人及其親友在短時間内死於非命，焦慮與苦楚催生出大量直賦式“詞史”寫作。而在深層上，世變帶給詞人的盛衰之感持續發酵，與常州詞學的“詞史”觀念形成合力，推動被詞學家重塑的咸同“詞史”寫作面貌得到了更大範圍的接受，使其中備受推崇的《水雲樓詞》在清末民國時期以多元的維度——頻繁的詞集刻印；詞學家在詞選、詞話、日記、論詞詞中的推崇；現代刊物的介紹、研究、補遺；現代學術論著、教材的評述等等——展開了經典化進程，成了咸同“詞史”寫作的典範，也進而鞏固了重塑後的咸同“詞史”寫作面貌及其影響。

（作者：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引用書目

一、專書

丁紹儀:《清詞綜補・附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太平天國史料彙編》,冊 1。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年。

朱孝臧著,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箋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

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朱彝尊、汪森編,孟斐標校:《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吴梅著,郭英德編:《吴梅詞曲論著四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

吴欽根:《譚獻稿本日記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22 年。

沙先一:《清代吴中詞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

沈沂曾:《瘦吟草》。蘇州:蘇州大學圖書館藏,1942 年鉛印本。

周濟:《詞辨》。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二年鈔本。

周濟:《詞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周濟著,段曉華輯校:《周濟詞集輯校》。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年。

莫立民:《近代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

徐子苓:《敦艮吉齋文鈔》,《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徐世昌編,聞石點校:《晚晴簃詩匯》。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

徐珂:《清代詞學概論》。上海:大東書局,1926 年。

徐漢蒼:《碧琅玕館詩餘》。南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刻本。

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陸初望:《懷白軒詞鈔》。南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五年刻本。

陳乃乾:《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2 年。

張宏生:《全清詞・嘉道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

黄燮清:《國朝詞綜續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鄒祇謨、王士禛:《倚聲初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馮永年:《看山樓詞》。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刻本。

馮乾：《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

蔣春霖撰，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劉毓盤：《詞史》。上海：上海書店，1985 年。

潘曾瑋：《玉泠詞》。南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四年刻本。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

譚新紅：《清詞話考述》。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

譚獻：《篋中詞》，《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譚獻著，方智範編注：《增廣復堂詞話詳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年。

譚獻著，范旭侖、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譚獻纂，羅仲鼎、俞浣萍整理：《復堂詞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

二、論文

王蘊章：《詞史卮談》，《同聲月刊》第 1 卷第 5 號（1941 年 4 月），頁 95—99。

毛盼盼：《論〈清詞綜補〉的成書過程與體例特徵》，《棗莊學院學報》2015 年第 1 期，頁 33—37。

任軻：《咸同變局與詞壇新動向》，《文學遺産》2024 年第 2 期，頁 140—152。

李劍亮：《論丁紹儀對譚獻詞學闡釋論的影響》，《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頁 144—149。

郭文儀：《時代變局中的家國書寫與詞風進境——以〈庚子秋詞〉〈春蟄吟〉爲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6 期，頁 32—41。

唐圭璋：《蔣鹿潭評傳》，《詞學季刊》第 1 卷第 3 號（1933 年 12 月），頁 32—42。

孫克强：《丁紹儀詞學批評論略》，《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54 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年），頁 511—528。

張宏生：《時代變局與詞史書寫——太平天國戰爭與趙起的詞體創作》，《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3 期，頁 124—130。

張宏生：《詞史、興寄與時代——太平天國戰爭前後詞壇創作的理論自覺》，《中華文史論叢》2022 年第 3 期，頁 349—381。

張宏生：《戰亂、民瘼與文圖記憶——論余治〈江南鐵淚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5 期，頁 1—13。

彭建楠：《〈滄海遺音集〉與清季民初的詞史演進》，《學術研究》2023 年第 10 期，頁 169—176。

閔豐：《世變的迫力：鴉片戰爭時期“詞史”書寫的新向度》，《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 年第 10 期，頁 1—16。

龍榆生：《詞林要籍解題》，《同聲月刊》第 1 卷第 4 號（1941 年 3 月），頁 65—76。

On the Writing, Recomposing, and Canonization of *Ci Shi* in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 Eras

Mo Chongy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eras, impacted by the war, poets directly recorded their observations, experiences, and sorrows in their *ci* lyrics, producing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i* as history" (*ci shi*) that directly narrated events. These works did not align with Zhou Ji's concept of *ci shi* in his theory of evocative and allusive expression. The sense of rise and fall brought by the war continued to ferment after the war, whil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zhou School's ci studies gradually expanded. Zhou Ji's concept of *ci shi* was accepted and developed on a broader scale. Critic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angzhou School, while rescuing the lyrics that survived the war, amplified the voices of evocative and allusive *ci shi* and even constructed the *ci shi* significance of some works produced before the war.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war and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Qing-dynasty *ci* writings converged to form a synergistic force, which dominated the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ci shi* writing during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Keywords: *Ci Shi*, Xianfeng-Tongzhi War Devastation, Changzhou *ci* studies, directly recording, evocative and allusive